

【文学艺术研究】

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发展历程谏论^{*}

胡永杰

摘要:作为人民诗人,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感情之深厚是世所公认的,但他的感情有一个逐步发展、加深的历程。这其中,天宝末期至乾元时期、成都草堂居住时期、夔州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他创作出了《兵车行》、《北征》、“三吏”、“三别”等杰作;第二阶段中,他创作出了《为农》、《春日江村五首》、《寒食》、《草堂》等佳什;第三阶段,他又创作出《峡中览物》、《最能行》、《负薪行》等名篇。三个阶段中,当以成都草堂时期为最高潮,它奠定了杜甫与劳动人民感情的基础。

关键词:杜甫;劳动人民;感情;发展过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150—04

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的高潮,人们一般认为在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主要体现在当时《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诗作的产生上。如朱东润先生所指出,杜甫诗歌有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起到《同谷七歌》为至,这时因为安史之乱,他看到了人民的痛苦,极端同情人民,他的诗也就成为人民的诗,现代人对于杜甫的推崇,主要是推崇他这一阶段中的作品。^①其实具体考察的话,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形成、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中,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成都草堂居住时期、夔州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阶段。而且,他和劳动人民感情发展的高潮应该说是成都时期,而非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在长安、华州期间写出了著名的《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诗作,描述了玄宗大肆开边的政策和安史之乱所带给劳动人民的巨大

灾难、危害,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后人赞扬杜甫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赞美杜诗“诗史”精神的重要成就,所依据的首先就是这些作品。这个时期确实是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情感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这时唐王朝的政治环境开始由前期的比较清明转向了后期的日益黑暗、混乱,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劳动人民的生活也由较为安定、富足转为了深受兵役、赋税、战乱的压迫危害,生活困苦不堪的艰难状态。而这时也正是杜甫结束青年时期浪漫、快意的漫游生活,开始在长安谋求仕进,饱尝世事的炎凉,目睹政治的黑暗和普通人民的困苦与不幸的时期。于是他的政治理想由青年时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浪漫、豪壮转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沉郁、务实,开始有了对待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不过从杜甫前期的经历看,他这时期尚没有和普通劳动人民深入交往的机会,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他关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悲惨遭际,主要是出于一个正直仁厚的儒学之士的社会

收稿日期:2013—06—03

*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二十世纪杜甫研究史》(2012CWX025)。

作者简介:胡永杰,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州 450002)。

责任和悲悯情怀,而他对劳动人民的情感主要是同情而尚难说是深情的热爱。

杜甫弃官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长安等都市度过的,或周旋于王公名流之间,或和文士们交游酬唱,或在左拾遗、华州司功等任上,真正接触普通劳动人民的机会很少。当然这也不是绝对没有,之间他毕竟曾把家小安置在奉先县、鄜州等地,京城与家中往返之间是可能和当地百姓有所接触的。例如他在鄜州时所作《羌村三首》其三其中写道“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涕纵横。”^②可见他们一家和羌村父老相当熟识而且感情深厚。不过,杜甫把家安置在羌村等地的时间很短,而且他自己并没有生活在这里,而是在长安奔波,回家看望时间也不多。因此,总体来看他早期和普通劳动人民的接触、交往是很有限的。

总之,入蜀之前,杜甫虽然关心、同情劳动人民,和他们也有过一些交往,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接触、交往很少,他走进普通人民中间,和他们长期、深入地接触、交往尚有待后来入蜀居住浣花草堂时期及夔州时期。

二

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辞官携全家来到秦州,他曾在那里的东柯谷居住过,和阮隐居、其从侄杜佐、僧人赞公交往密切,虽然他没有在诗歌中记载他和当地百姓交往的情况,但当时的环境下他是有机会和劳动人民接近的。东柯谷自古就有当地人民纪念杜甫的杜公祠,后来人们还把那里的一些村庄、学校、遗迹命名为子美村、子美树、子美泉、子美小学等,并流传着一些关于杜甫在那里的美好传说^③,这说明杜甫和当地人民是有着较为深厚的情谊的。不过他在秦州停留的时间很短,仅有大约3个月,并没有定居下来,即便和当地劳动人民有所接触,也很难深入。

入蜀后,杜甫在成都西郊的浣花草堂定居下来,而且前后居住达3年多的时间,由于这一段长期而安定的乡居生活,他才真正有机会和劳动人民深入、长期地交往、接触,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

浣花草堂一带不仅是成都郊外一个景色优美的

幽静之地,而且“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为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其一),也是一个有农户居住的乡村。杜甫在这里耳闻目睹的不仅仅是清溪环绕,竹木掩映,春花烂漫,鸥燕相亲的幽美景色,还有许多淳朴美好的乡村生活情景。“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春日江村五首》其一)、“村春雨外急,邻火夜深明”(《村野》),这是繁忙而充实的农村劳动图景。“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屏迹三首》其二)这是农闲时村中箫鼓相乐,泛舟垂钓的乡村行乐图。“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泛溪》)这是村中儿童带着淘气劲儿的溪中嬉戏图景,连杜甫自身也受到了他们的捉弄。这一幕幕乡村生活图景,无疑会陶冶、感染杜甫的情怀,加深他对乡村人民和乡村纯洁朴实生活的热爱与亲近。

确实如此,在草堂生活的三四年时间里,杜甫和邻翁田父往来十分密切,关系融洽,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寒食》诗云“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这可谓他当时和邻里父老、村中百姓交往情形和亲密关系的概括。杜甫这些话没有太多夸张,他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就生动记载了一次被农家老翁邀去家里喝酒的经过,正是“田父要皆去”一句最好的注脚。这位老翁豪爽热情,朴实忠厚,也有农家人的粗鲁,不甚讲究礼数,甚至有些狡黠,有意讲一些杜甫爱听的话去讨好他。但是杜甫却“未觉村野丑”,和他喝得热烈而尽兴,可见他对普通劳动人民是多么热爱而宽容。《遣意二首》其二云:“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杜甫可以晚上差使年幼的孩子去邻家赊酒来喝。“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他可以无拘无束地在黄四娘等邻居家中游览看花。“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家里来客人,他还可以邀邻居过来一块喝上几杯。如此种种,都生动而丰富地展示了杜甫和邻里乡亲之间亲密无间、无拘无束的关系以及他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真诚和情谊。这时杜甫真正走进了劳动人民中间,和他们成了平等的朋友。

而且,杜甫和邻里百姓的深厚情谊是相互的,老杜热爱邻里们,对他们真诚、温厚,邻里们也喜爱杜甫,处处关心他。《晚晴》诗云“时间有余论,未怪老夫潜。”仇兆鳌注云“言时间蜀人之论,未尝怪此

一潜夫也。本传谓公在成都,与田夫野老相狎荡。盖能亲厚于人而人共悦之,故有后二句。”^④可见杜甫隐居浣花溪,很得当地百姓的好评,人们并不觉得他是一位让人敬而远之、不可接近的高逸隐士。正因为他的随和可亲,对邻里乡亲热爱尊敬,他也赢得了村中百姓的尊敬和热爱。平时有些什么时鲜、美味的东西,大家也会惦记着老杜一家,送一些给他们品尝。“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送朱樱》)“邻家送鱼蟹,问我数能来。”(《春日江村五首》其四)这两首诗又恰可作为前文所引“邻家问不违”一句的注脚。“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需。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草堂》)当因成都叛乱,杜甫在梓州一带漂泊一年多重回成都草堂时,邻里们都喜气洋洋,携酒慰问,那种场景我们今天读来仍然为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所感动。

成都草堂中所作的这些诗,虽然不像前期所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作那样题材重大,境界壮阔,但是却更加深情灌注,令人动容。因为这时作品中写的主要是他与附近乡邻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平常而琐碎的内容,但也正是由于它们的日常化、琐碎性才使这些诗歌更加热情洋溢、真切鲜活,代表着杜甫与劳动人民之间亲密无间、了无距离的关系。萧涤非先生评论西南漂泊时期这类诗歌时说“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⑤这种抒情性的增加,原因也正在于杜甫和劳动人民之间感情的丰富与浓烈。

总之,在成都草堂一带的乡野生活环境使杜甫有了深入接触普通劳动人民的机会,那里乡邻父老的善良、淳朴、热情感染了杜甫,使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关系,深厚诚挚的情谊。正是在成都草堂的定居生活,杜甫才真正走进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对他们有了深入的了解,有了进一步的热爱。甚至可以说,是草堂的生活经历,使杜甫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真正的人民诗人。

三

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居住是继成都草堂之后,又一次有机会和普通劳动人民深入接触的时期。他从大历元年的春末夏初从云安移居夔州,至大历三年正月出峡东下,在这里共居住了一年零

九个月,时间虽不算久,但他曾在瀼西、东屯定居过,包括最初在西阁的居住,这些都主要是乡居生活,和普通劳动人民接触的机会挺多。

夔州时期杜甫并没有像成都草堂时那样和当地人民建立起融洽密切的关系,因为夔州的风俗人情颇有些让他感到不满或不适的地方,使他体验到了劳动人民中落后、狭隘的一面,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经历则是对他对待劳动人民感情的一个磨砺和考验。杜甫显然经受住了这个磨砺和考验,在不太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他依旧保持着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关注与热爱,这使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有了理智老成和执着沉厚的力量与境界。同时,夔州时期,杜甫接触到了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的底层劳动人民,培养出了对他们的尊敬、赞赏之情,拓展了他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广度。

杜甫在夔州曾反复表达过对当地一些民风人情的不满和不适之感。他认为那里“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抱怨“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最能行》),“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戏作俳谐体二首》其一)。他在《最能行》和《负薪行》两诗中对当地“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重利轻学等落后的风习进行了批判;《雷》、《火》两诗对夔州一带大旱时焚山、击鼓,以惊蛟龙的迷信陋俗也做了严肃的批评。从这些抱怨和批评中可以看到他在夔州和当地人民相处得并不十分和谐顺心,对当地的不少陋习是颇感不满的。劳动人民有纯朴宽厚的优良品质,也有落后狭隘的一面,这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杜甫以前也不至于完全不明白这一点。但是在中原和长安时期,他和劳动人民接触得少,有一定距离,这方面的了解会比较模糊。成都时期他和浣花草堂一带的乡邻关系处得融洽,加之他又是当地长官裴冕、严武、高适等的客人,当地人民对他难免会多一些格外的尊重,所以他对劳动人民落后一面的体验也不会十分深刻。夔州时期,他虽然也是都督柏茂琳的客人,但柏茂琳对于他的尊重完全不能和严武相比,杜甫作为一个衰老多病的孤老头儿,人们对他自然不会有太多格外的尊敬。加之夔州风俗人情确实有迥异于北方地区之处,也增加了他和当地人民的隔阂,所以在夔州的生活使他较为充分地认识到了劳动人民落后的一面。

但是,面对劳动人民的落后、狭隘之处,杜甫的认识是清醒而理智的。对于夔州男子重商轻学,女

子常年操劳、老丑难嫁以及“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的风俗人情，他提出了“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和“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追问，并没因为一时一地的负面因素而影响他对劳动人民的高度评价和全面认识。同时，在和当地人民相处得并不太和谐的状况中，他也依旧保持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与关心。《白帝》云“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他对夔州人民饱受战乱摧残的境况表示了高度的同情和伤怀。《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诗云：“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云“拾穗许村童。”《又呈吴郎》诗中对西邻居住的一位老妇人更是照顾体贴入微。他对待当地人民的态度与情谊于此可见一斑。《甘林》诗中则描绘了他和邻里一位老农漫步田间，相与交谈的情形：

明朝步邻里，长老可以依。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霏菲菲。子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

这段描绘中，杜甫对劳动人民悲惨境况的同情和忧伤以及和他们患难相依的深挚感情都跃然眼前。而《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诗云：“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这里劳动人民已经不仅仅是他同情、关心的对象，在遭受州府官吏的白眼和嫌弃时，恬静的茅屋，宽厚、善良、纯粹的邻里乡亲反而成为了他获得心灵慰藉、精神依托的源泉。

这些诗歌中的描写充分表明杜甫在夔州时期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依旧是诚挚而深广的，诚然，这种热爱并不如成都草堂时期那么热情洋溢，但在遭遇“误竞南风疏北客”的冷落和目睹当地落后风俗的情况下，杜甫能坚定地保持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标志着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上升到了更为理性老成和深沉执着的高度。

夔州时期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感情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他接触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民，和他们之间产生了情谊，拓展了他对劳动人民情感的内涵。

儒家思想中向来严华夷之辨，杜甫作为一个比较纯粹的儒士，自然也有这样的思想。而且他生长于两京地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汉民族和

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要么是中外使节庄严的往来朝谒，要么是唐王朝和吐蕃、回纥、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互相征伐侵扰。因此，杜甫思想中对于少数民族人民是有着距离感甚至是敌视感的。如早年在长安写的《留花门》诗中就对回纥民族颇感担忧“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在秦州时，因地近边境，杜甫目睹少数民族的骄纵之行，对之戒备之心更浓“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日暮》）“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寓目》）对羌族人民颇怀忧虑戒备之情。在成都、梓州等地时，正是吐蕃与蜀中边境战事警急，松、维、保三州最终沦陷于吐蕃的危急时期，这时杜甫对于吐蕃、南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忧虑之情更是达到浓烈的高潮。但在夔州，杜甫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有了和平相处的机会。他家中雇佣的几个僮仆中，有的就是当地獠人。在日常的交往接触中，杜甫认识到了他们淳朴、无私、真诚的高尚品质，并由衷地表达了对他们的赞扬、尊重和热爱之情。如《示獠奴阿段》、《信行远修水筒》等诗中所描画的阿段、信行都是如此，他们吃苦耐劳，朴实忠厚，且性情纯洁清静，赢得了诗人真心的尊敬。可以说通过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接触，杜甫认识到了他们的高尚品质，他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看法有了重要的改变，从而使他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内涵和广度有了重要的拓展。

杜甫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湖湘一带度过，由于一直漂泊不定，他难以有机会和劳动人民有较多接触，对他们的感情发展变化不大。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成都草堂时期和夔州时期是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发展最主要的三个阶段。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他开始形成关注、同情劳动人民困苦生活和不幸遭际的情怀，这种情怀一直保持了一生。

注释

- ①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9页。②本文所引杜诗均出自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③参看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撰《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④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中华书局，1979年。⑤萧涤非《人民诗人杜甫》，《杜甫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第247页。

责任编辑：行健